

**1999至2012年間民衆幸福感的省籍 / 族群差異：  
社會分層、我群意識與公平感受**  
**Happiness and Ethnicity in Taiwan, 1999-2012:  
Social Stratification, Sense of We-group, and  
Social Justice**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張苙雲\*

Ly-Yun Chang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 譚康榮\*\*

Tony T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張苙雲, E-mail: [sociochang@gmail.com](mailto:sociochang@gmail.com).

\*\* 譚康榮, E-mail: [soc.tam@gmail.com](mailto:soc.tam@gmail.com).

# 1999至2012年間民衆幸福感的省籍 / 族群差異： 社會分層、我群意識與公平感受

張苙雲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譚康榮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

---

## 中文摘要

省籍是1980年代台灣的重要政治社會議題，省籍差異和國家認同的糾葛被視為台灣社會深層矛盾。有別於社會分層文獻，本文將1980年代以降族群論述的升溫視為前導的社會政治脈絡，假設大多數民衆的族群 / 省籍身分已被喚醒，因而1999年至2012年間民衆的幸福感，是自身族群 / 省籍受到大時代族群政治論述洗禮的效應之一。本文使用社會意向調查，檢驗社會分層、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三個研究假設，主要發現有三：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民衆的幸福感是一路下滑，只是下滑的勁道趨緩。第二，閩南人的幸福感顯著高於原住民和外省人，但和客家人沒有差別。閩南人在這14年間的趨勢與客家、原住民和外省人都有顯著差別，各群體與閩南人之間的差異在2006年後先後縮短。第三，教育程度、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可提昇幸福感。這四個因素可以全然解釋原住民之幸福感何以落後閩南人。但除了公平感受外，其他因素都無法有力解釋外省人的幸福感何以落後閩南人。

**關鍵詞：**幸福感、省籍差異、我群意識、公平感受、台灣社會意向調查

1949年之後處於特殊時空環境和面對統治正當性焦慮的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省籍歸屬是受壓抑的敏感議題。1970年代台灣社會經濟好轉而致與新加坡、香港和南韓同時邁入新興工業經濟體之林，於其時，各種本土化的主張與論述蜂擁而起，除了社會科學研究朝向以台灣為實驗室的本土進路外，在批判黨國體制、追求自由民主大旗之下，政治參與的省籍不平等以及台獨論述，浮上檯面而公開討論倡議。省籍歸屬循著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脈絡轉化成為族群身分。政治和社會階層學者，從政治排外的視角，分析人們生活中省籍歸屬這種先賦身分，如何架構著國家意識形態的親疏遠近與國家資源的分配，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機制。社會分層的學者指出省籍出身是為台灣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機制（Lin, 1998；林鶴玲和李香潔，1999；Tsai and Chiu, 1993；林忠正和林鶴玲，1993；吳乃德，1997；蔡淑鈴，2001；陳婉琪，2005；Jao and McKeever, 2006）。然而實證資料顯示省籍的教育不平等在1960之後出生的世代，已然拉近（駱明慶，2001；蔡淑鈴，2004；蘇國賢和喻維欣，2007；Tam, 2007）。世代更替與政治系統邏輯的運作下，「族群想像」作為社會分類的重要性正在減低（如顧忠華，2004）。

族群研究的文獻指出，族群身分認同有很強烈的心理和情緒的成份，足以將人們的生活世界區分為我群和他群。雖然學界認為省籍主要用於選舉時之動員，日常生活中族群互動是否存在隔閡，仍是一個有待證實的經驗性問題（王甫昌，2002）。然而，另有學者觀察到「族群差異與國家認同爭議的糾葛已形成台灣社會的深層矛盾」（張嘉尹，2008：124）。基於此，近三十年「族群」論述的倡導之下，被強力動員的省籍分層，劃分出來的我群與他群（四大族群說），這個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建構後的先賦身分」，對台灣民眾的社會心理造成什麼影響？是本文關切的焦點。我們關心人們如何評估幸福感受，是不是有如幸福感文獻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經濟地位等等為重要的分層維度，台灣民眾亦根據族群（原住民和漢人）和省籍（本省人和外省人）而劃分出來的我群與他群，在幸福感這類社會心理反應，呈現明顯差距？據此，本文設定的第一個目標在於實證上剖析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其次，我們進而評估人們如何看待身處的社會？他人會否伸出溫暖的手？是否有安身之處？是否被公平對待？等類似的社會心理反應，如何幫忙我們理解人們對個人幸福

感的評估？透過研究設計及實證資料分析，我們將分析的時間點放在1999至2012年間民衆幸福感。這期間台灣社會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成就了台灣民主政治進程的歷史記錄。這段時間更是離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時初次提出族群論述和1993年的四大族群說，已過了多年，同時，省籍亦歷經多次中央和地方選舉的動員，因而我們認為觀察到的1999年至2012年間社會心理反應的族群／省籍差異，可以視為族群論述的後續社會效應。

本文分析的對象設定於1941年和1980年間出生的受訪民衆。固然各個年齡的民衆都無法自外於大社會，這段時間出生的人是在台灣受完整教育、成家立業的一群。這段時間出生的人，經歷了取消籍貫註記。無論是本省人、原住民或是外省第一代，是1980年代前後，觀察到省籍論述的興起並轉型為族群政治。這段時間出生的人是被省籍論述喚醒的一群。

根據王甫昌綜合文獻而對族群（ethnic group）下的定義：「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是共同的祖先、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獨特的社群的一群人」，顯而易見，根據這個定義，與目前聲稱的四大族群，顯有扞格不入之處。族群當作台灣社會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學界也不盡沒有其他的看法。做為一個移民社會的台灣，原漢之間、閩客與外省人之間、閩客之間、再加上新移民，無論用族群，或是省籍，都難以周全精準地傳達台灣社會之社會組織特性。本文不準備進入省籍／族群分類的爭辯，本文之目標在於觀察做為社會心理狀況的幸福感，其四大族群／省籍群體之間差異長期趨勢。在引用文獻時，則全然根據該文作者的使用方式。

## 壹、幸福感研究的重要辯論與實證發現

幸福感是長期而相對穩定的悠遊自得、安然自在的心理狀態，不是短期上下起伏的情緒波動。長期以來，幸福感研究一向是心理學的研究主題。經濟學者在七零年初期加入戰局，開始研究幸福感，領頭羊之一是Easterlin教授。受到他研究的啓發，經濟學者開啓了一系列有關所得和幸福感的關係的研究，企圖論證「多」（指高所得和高平均國民所得）和不均與「好不好」（幸福感提昇）的關係。相對而言，社會學者對民衆幸福感的課題，就不是那麼看重，

甚至不認為幸福感是個社會學研究課題（Firebaugh and Schroeder, 2009）。事實上，相關主題的論文刊在主要社會學期刊非常之少，在2008年之後才刊出三篇有關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如Schnittker（2008）、Yang（2008），以及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

幸福感研究之所以逐漸走紅，多少與近三十年全球永續發展的訴求有關。學界反省的是，經濟發展的目的能否超越純經濟效果之平均國民所得的增加，而推進到社會整體品質的提昇（Stiglitz et al., 2009）。幸福感可以成為有別於國民生產總額，用以衡度經濟發展的量尺。幸福感這個概念，雖然看似粗略，但已廣泛接受，是為測量整體經濟發展效能的量尺之一。

至於哪些因素導致幸福感受的增減呢？大概可以從三個理路討論。第一，是社會分層假設。大量的文獻都證實教育水準、所得以及就業與否等社會經濟指標與幸福感存有正向關係（Di Tella et al., 2001; Hagerty and Veenhoven, 2003; Frijters et al., 2004; Liao et al., 2005; Caporale et al., 2009）。因為經濟學者於此議題介入之深，所得之幸福效果是相關研究之大宗。然而，Inglehart與Klingermann（2000）回顧了相關研究，發現雖然高所得者，自認比較幸福，但是所得最多只能解釋百分之四的幸福感受變異量。跨國比較研究顯示，所得的增加對幸福感的促進作用甚小（Di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8）。至於教育、宗教、性別、年齡，就不用提了，解釋力更低。其次，經濟學者Easterlin指出，經濟發展而後帶來所得水準的提高，並未能帶來等比例幸福感的提升。有錢國家的幸福水準不比貧窮國家來得高（Easterlin, 1995）。在任何時間點和任何社會有錢人的幸福感都比較強，但是社會的幸福感受卻未能伴隨著所得水準提高而提高，這是為著名的Easterlin Paradox（Easterlin, 1974）。

Easterlin Paradox之後的研究，逐漸跳脫絕對所得的框架。幸福感來自於比較，而不是實質擁有以及可以享受的資源量的多寡。據此，研究主軸多加了一個維度，而放在相對所得對幸福感的作用（Clark and Oswald, 1996; Rojas, 2005; Ferreri-Carbonell, 2005; Caporale et al., 2009）。研究者鑽研的議題包括，所謂比較是與一般性的他人相比？還是條件近似者相比？還是與過去的自己相比？還是與自己的期望相比？對應於絕對所得，因著比較標準可以調整，也有可能因人而異，顯示出比較標準是武斷建構的。無論如何，相關研究已發現

參考對照團體之所得，對個人幸福感的影響（Ferreri-Carbonell, 2005）。住在窮人中會讓自己覺得比較幸福，只要窮人不要離得太近（Firebaugh and Schroeder, 2009）。

第三條理路肇因於跨國、長期追蹤資料的研究，觀察到的所得和幸福感的矛盾關係。學者們因而轉向宏觀層次，如經濟面的GDP，失業率、通貨膨脹（Di Tella et al., 1997;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 Di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8）、政治面的福利國家與民主（Inglehart and Klingemann, 2000; Dorn et al., 2006）、社會面的所得不均（Alesina et al., 2004）以及鄰里環境（Firebaugh and Schroeder, 2009）等。Alesina等人（2004）發現在所得不均的地方，人們傾向認為自己不幸福。但是香港和台灣的比較研究卻發現高居世界所得最不均的香港，其幸福感高於台灣。香港人的幸福感在2003年與台灣人交又後，持續微幅上揚至2005年（張荳雲，2011），稍後資料分析，到2009年止，仍觀察到香港人幸福感的上揚趨勢。如何解釋台灣與香港之間幸福感走勢的差異，在理論詮釋上甚具挑戰性。現有文獻觀察到鉅觀特徵與幸福感關連，然同時仍有許多不一致的研究發現，顯示存有許多缺口，有待更多探究。

國際比較分析的結果對前述三條理路，並未能得到一致的支持或批駁。我們認為，社會心理反應有可能幫助我們理解跨國主觀福祉的變異。也就是說，經濟豐裕和民主政治的後效，不止在於平均國民所得的提高等，而同時需要讓人民「有感」，以致於在社會生活中體現自由選擇、當家做主感受、社群意識，表現出社會歸屬感和凝聚力。受到社會學者Alwin於1987年之研究的啓發，我們認為應將社會心理反應置放在研究舞台的中央。如同第二條理路一樣，Alwin的研究以「與他人相較」為重點。不同於他人將「與他人相較」側重於差多少或與誰相比，在根據Jasso的公平衡度理論（theory of justice evaluation）（引自Alwin, 1987）推演出可能影響個人生活滿意感受的三個的因素中，Alwin發現報償是否公平（實際報償和公平報償之比）的重要性。期望報償和實際報償的差距亦有影響，但不如預期的強。同樣Inglehart和他的同事於2008的研究，很有洞見地發現人們主觀認為自己是否擁有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與經濟政治發展脈絡一樣，影響人們幸福感受，選擇的自由甚且比經濟政治發展更為重要。個人對置身的社會所做之詮釋，反映的是個人

反應的異質性。這些社會心理反應同時蘊含評斷和情緒的面向，受到形塑個人價值以及社會風氣的制度脈絡和歷史情境所左右，或可有助於瞭解幸福感的成因。這些研究路數再一次提醒結構與個人連結的樞紐位置。

基於認同這條研究理路，我們從社會學教父涂爾幹概念中社會凝聚力是立基於公平（justice）和慈善（Scheonfeld and Meštrovi, 1989）的視角切入，公平和慈善之所以為凝聚社會眾人的基礎，背後的理念是平等對待、不分彼此、助人利他。我們因而探討我群意識（we-group）和公平感受（fairness）這兩類社會心理反應與幸福感的關係。具體而言，民眾的我群意識有可能受到個人經驗、社會背景所影響。對有需要的同胞或肢體，會不會伸出援手？願不願意利他？有沒有人饑己饑的同理感受，亦反射出人們對整體社會的認同與愛惜。公平感受亦然。公平感受固然出於與他人、與過去、與自己期望，或是與自己的努力相比，相當程度上反映個人特質。公平感受更是社會建構的，報償是否配得、報償與努力（或能力）是否不相襯，反射出他所認知的整體社會相對剝削和不公平的評斷。我們認為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等社會心理反映，是中介機制，介入社會分層文獻中的教育、所得、工作地位、性別、種族、年齡等等個人特徵與個人幸福感受的關係。其中的重要基底在於社會學的核心概念：社會凝聚力。生活在不認為別人願意伸出援手的社會，認為自己被偏待的社會，可能會與生活在富人區的窮人一樣，都影響他個人主觀福祉的評斷。也會如生活在依個人條件而分配國家重要資源的社會一樣，影響個人主觀福祉。生活在社會凝聚力強的社會，有歸屬感和安全感，帶給人們幸福感；反之，幸福感低。

## 貳、族群論述中幸福感的走勢：有關族群 / 省籍落差的假設

在臺灣族群論述的脈絡上，如何推斷幸福感在不同族群 / 省籍間的差異呢？「族群認同」是一種集體認同，是在與重要他者比較差異以後，所產生的自我肯定。以要求平等對待為目的的「族群意識」或「族群想像」多出於弱勢族群，「『族群意識』通常是『弱勢者』的意識。只有弱勢者才會認為自己受到的待遇是與其文化身分有關。優勢者通常不太會認為自己構成一個族

群、也不會認為自己得到的較好報酬與族群（文化）身分有關。」（王甫昌，2002）「族群認同」和族群意識企圖突顯的是人們之間的差異，原住民對應於漢人；本省人（早期漢人）中的客家人對應於閩南人；漢人中的本省人對應於外省人。由弱勢族群，如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之要求優勢族群如漢人、閩南人、外省人平等對待（Camoroff et al., 2009）。社會分層根據教育、所得、職業或生活方式將社會區別和凝聚成「我群」和「他群」，社會階級意識用的是水平的軸線。相對而言，族群／省籍歸屬，如同性別和年齡，將民衆區分和凝聚，成「我群」和「他群」，族群／省籍身分和意識標示的是垂直軸線。不可否認，二者有可能交叉重疊。過去十多二十年突顯出身為基礎、強調弱勢與優勢之別的社會分類以及族群認同和族群意識，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我們認為，有兩套假設，可以檢驗。

第一套假設檢驗族群／省籍的我群與他群之區分是否滲入日常生活的運作。如果台灣社會民衆的歸屬感，經過多年的倡議和動員，普遍地以「族群」做為理解事務的參考架構，族群／省籍歸屬應一如社會經濟地位，是區分幸福感之高低，有意義的維度。有如性別、社經地位等社會人群分類的一種「想像」，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會表現在民衆社會心理反應。相對應的虛無假設則是，經過十多年族群論述，族群／省籍仍停留在選舉動員的語言，並未能取得一如性別和社經地位一樣影響力，表現在幸福感的評估。觀察到的族群／省籍差異則可由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等社會分層維度理解。

### 一、族群／省籍分層假設：社會經濟地位對應於族群／省籍歸屬

H1：經過二十多年族群論述的倡導，弱勢族群意識被喚醒，幸福感於族群／省籍歸屬上的差序，不受教育與所得對幸福感作用所影響。幸福感不僅存有族群／省籍差序，幸福感的族群／省籍差序不能被社會經濟地位所解釋；

H10：幸福感在族群／省籍歸屬上的差異，源自於教育和所得在族群／省籍上的落差，不是個獨立的分層維度。

第二套假設進一步驗證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是否牽動民衆深層的社會心理反應。經過多年的族群論述以及各級選舉的動員，族群論述中的弱勢／優勢

說，喚醒並強化民眾之間的我群與他群之分別，牽動了社會凝聚，牽動了民眾相互比較後，認知到的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差異的標舉突顯並影響了個人的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並影響幸福感的評估。實證上，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應可解釋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相對的虛無假設則為，若未能牽動社會凝聚，則既或觀察到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的幸福感效應，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都與幸福感的族群論述效應無關。

## 二、族群論述脈絡中的我群意識：我群意識越強，幸福感越高

H2：我群意識對幸福感的影響，可以有效解釋族群 / 省籍歸屬在幸福感上的差序。民眾在幸福感上的省籍差序反映的是我群意識在族群 / 省籍歸屬的差序；

H20：我群意識對幸福感的影響，與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無關。

## 三、族群論述脈絡中的公平感受：公平感受越強，幸福感越高

H3：個人公平感受對幸福感的影響，可以解釋幸福感於族群 / 省籍出身間的差異。民眾在幸福感上的族群 / 省籍差序反映的是公平感受在族群 / 省籍歸屬的差序；

H30：公平感受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果與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無關。

## 參、資料與分析方法

這個研究使用1999年至2012年間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由電訪而得的三十個資料檔。其抽樣方法和資料使用，請見 <http://www.ios.sinica.edu.tw/si/>。本研究的焦點在於探討1980年代前後政治社會變遷，興起的省籍論述轉型為族群政治的社會效應。我們設定1941年至1980年間出生的世代是受到族群論述影響而被喚醒其族群意識的一群，共27,346人。我們使用的變項包括幸福感、我群意識、公平感受、教育程度和家戶所得以及個人基本人口變項如性別和年齡，其定義和測量說明如下：

## 一、依變項：幸福感

幸福感的測量來自「整個說來，您最近的日子過得快不快樂？」這個題目，答項包括「1」非常不快樂（8.32%）、「2」不快樂（19.17%）、「3」快樂（53.34%）和「4」非常快樂（19.18%）（表1），族群／省籍間差異顯著。

■表1 各變項依族群／省籍歸屬之敘述性統計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省人	總計
年齡（21-71）					
平均數（標準差）	43.34 (10.65)	44.64 (10.82)	39.95 (10.27)	43.74 (9.78)	43.38 (10.58)
總計	19,641	3,012	1,224	3,205	27,082
教育年數（0-18）					
平均數（標準差）	11.80 (3.69)	12.19 (3.40)	9.88 (3.77)	13.42 (3.13)	11.95 (3.66)
總計	19,577	3,007	1,222	3,201	27,007
家庭所得（1萬以下-21萬以上）					
平均數（標準差）	7.16 (4.92)	7.61 (5.01)	4.20 (3.54)	8.25 (5.14)	7.21 (4.96)
總計	17,715	2,727	1,135	2,986	24,563
性別					
					$\chi^2 = 8.42$
男性	49.60	50.27	46.73	47.68	49.31
女性	50.40	49.73	53.27	52.32	50.69
總計	19,641	3,012	1,224	3,205	27,082
幸福感					
					$\chi^2 = 42.72$
非常不快樂	8.38	7.58	9.01	8.37	8.32
不快樂	18.75	19.26	22.40	20.35	19.17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省人	總計
快樂	54.16	51.86	46.09	52.63	53.34
非常快樂	18.71	21.30	22.49	18.65	19.18
總計	17,251	2,638	1,165	2,761	23,815
公平感					$\chi^2 = 121.56$
非常不公平	10.15	10.43	15.17	10.62	10.52
不公平	23.39	24.05	35.58	22.36	24.00
還算公平	35.16	34.38	25.53	36.84	34.75
公平	22.17	21.68	17.31	20.86	21.69
非常公平	9.12	9.46	6.41	9.32	9.03
總計	12,194	1,850	936	2,071	17,051
我群意識					$\chi^2 = 399.18$
只會管自己的事	26.55	27.13	50.19	30.54	28.45
一半一半	58.14	58.04	27.76	55.94	56.10
大部分的人	15.31	14.83	22.06	13.52	15.45
總計	13,226	1,902	1,070	2,086	18,284

## 二、自變項：族群 / 省籍歸屬

本研究的焦點在族群 / 省籍差異。理想上應該同時納入父親的籍貫和母親的籍貫。可惜的是，許多年的調查並沒有母親籍貫的資訊，為充分運用資料，本文的族群籍貫歸屬根據的是父親是台灣閩南人（72.52%）、客家人（11.13%）、原住民（4.52%）<sup>1</sup>或是外省人（11.83%）。

## 三、解釋變項

教育：教育年數是根據受訪者的教育程度，過錄而得，受過研究所教育

<sup>1</sup> 作者意識到以父親的族群歸屬來判斷是否為原住民，其實是有偏誤的，可視為本文的限制之一。

者，因為無法得知其學位以及獲得學位所花費時間，故統一設定為18年。

家戶所得：家戶所得的變項做了兩個重要的決定。首先，我們以所得中間點重新過錄原始碼，以接近實際差距，如10萬到15萬，改過錄為12.5，在分析時並取對數。其次，社會意向調查在有幸福感變項的各年資料中（總數為29,333），1999、2000、2001、2002只有個人所得（8,062，占27.5%），有些年份則只有家戶所得（10,501，占36%），有些年份二者都有（7,868，占26.8%）。二者資料都全者，約81%的家戶所得等於個人所得。為了描繪1999年以來的幸福感走勢，有必要處理家戶所得在前四年缺漏的問題。我們以個人所得、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年齡、族群／省籍、以及性別與婚姻之交互項，預測家戶所得，解釋量達77.9%，因而據此插補家戶所得缺漏者。

我群意識：「您認為社會上一般人通常都願意幫助別人，還是多半只管自己的事情，還是一半一半？」答項包括「1」只會管自己的事（28.45%）、「2」一半一半（56.10%）和「3」大部分的人（15.45%），族群／省籍間差異顯著。

公平感受：「就您個人的情形來說，您認為您的生活水準和您的努力比起來公不公平？」這項的答項包括「1」非常不公平（10.52%）、「2」不公平（24%）、「3」還算公平（34.75%）、「4」公平（21.69%）和「5」非常公平（9.03%），族群／省籍間差異顯著。

性別和年齡等變項在所有的分析中都視為控制變項，其次數分配，請見表1。

#### 四、分析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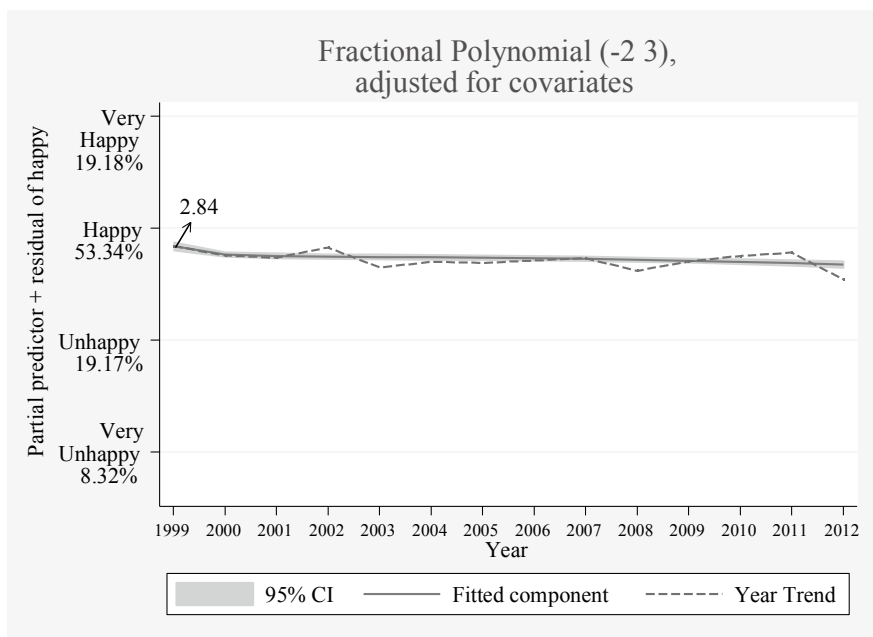
本研究時間趨勢的估計，是以1999年為「1」，而2012年為「14」。針對不同的目的，我們運用三種統計分析，首先，為了精準地呈現幸福感的年度趨勢，我們使用Sauerbrei和Royston（1999, 2002）所發展的策略，名為multi-variable fractional polynomial（mfp），以有效地偵測變項之間適當的非線性形式，如本研究之幸福感的年度趨勢，如果其趨勢變化較多，不止是二次方之非線性形式，mfp之估計策略有助於有效偵測。更重要的是，他們所發展的估計策略，可以估計群組之間差異的變化趨勢，如本文的第二的分析策略，讀者可

以參考STATA有關mfp和mfpi兩個指令之說明。在mfp模型下，我們納入趨勢與族群 / 省籍的互動項，用以估計不同族群 / 省籍歸屬者幸福感趨勢的差異，是為第二種分析策略。第三，最小平方迴歸模型，用以估計各解釋變項對幸福感的作用，因而將幸福感視為連續量尺（interval scale）。第一和第二種估計模型的結果，皆以圖呈現。所有的模型估計都是在控制了性別和年齡下進行的。研究發現的分為兩部分呈現。第一部分如下節，是描述性的，為了完整呈現幸福感的時序態樣以及不同族群 / 省籍歸屬者之間的差距，分析時使用的是1941年至1980年間出生資訊完整者，計24,051人。第二部分則進入假設檢定，由於有些年份沒有我群意識的資料，有些年份沒有公平感受資料，完全沒有缺漏值的受訪者人數急遽降為9,491，跨越的年份為1999年至2009年。

## 肆、側寫台灣民衆的幸福感：1999至2012年

整體而言，1999至2012年間台灣民衆幸福感的走勢出現一個轉折，不是直線發展。圖1呈現的是兩個結果，虛線呈現的是以1999年為參考年，納入模型的是十三個年度為類別變項（1/0），估計各年與1999年的差距。圖示，以1999年的幸福感平均值約為2.84為準（估計出來的截距），之後的十三年，其中只有2004年與之沒有顯著差別，其餘各年幸福感的平均值都低於1999年，差距比較大的兩年是2008與2012年，國民黨再次從民進黨手中取回政權之年。另一個是以Multivariable fractional polynomial模型估計這14年間的幸福感趨勢，得到一正（0.001）和一負（-0.024）兩個斜率組合。據此繪出來的圖呈現台灣民衆幸福感於1999至2000年間下墜的較為明顯後，直到2012年，持續下滑，以實線標示。圖1的Y軸標示了幸福感的量尺，由很幸福（過錄為4）到很不幸福（過錄為1），並呈現其各幸福感程度的百分比。圖1顯示台灣民衆的幸福感趨勢是由「幸福」往「不幸福」方向走。每年平均下滑的幅度雖然統計檢定上顯著，好像實質幅度似乎不大，例如，1999年的下滑幅度是， $-0.023$ （ $(0.001-0.024) * 1$ ），而2012年下滑幅度則增為 $-0.33$ （ $(0.001-0.024) * 14$ ），對應於間距是3，實在不算什麼。然若換算為百分比，可以讓我們對下滑有比較具體的理解：過了十年，接近百分之八（ $(53.34\% - 19.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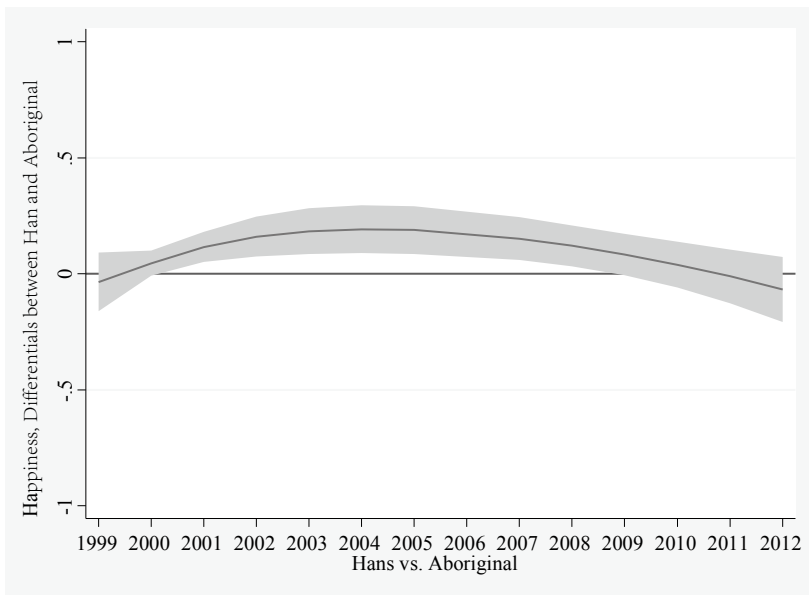
0.23) 的人，由幸福（過錄為3）往不幸福（過錄為2）的方向移動。過了十四年，則有超過百分之十一（ $(53.34\% - 19.17) * 0.32$ ）的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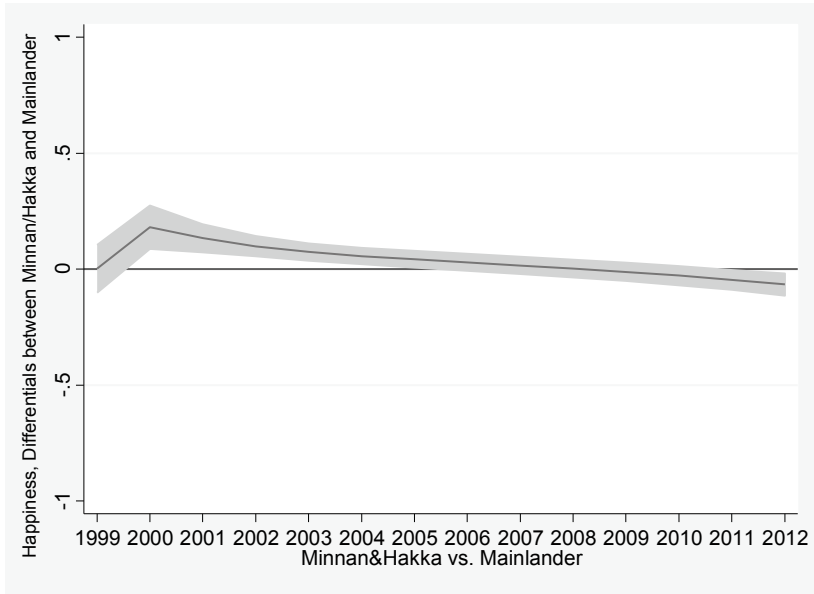
■圖1 台灣民眾於1999年至2012年間幸福感的走勢，N = 24,051

在族群和省籍等社會人群分類的脈絡上，我們呈現漢人（閩南、客家和外省人）與原住民、較早之移民（閩南和客家人）與1949前後之移民（外省人）、原住民與外省人）以及較早之移民之間（閩南人與客家人）等四個組合，在1999年至2012年間幸福感趨勢的差異。從表1的次數分配，我們觀察到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自認幸福者，都超過百分之五十，但原住民則只有46%。依據前述四個組合於幸福感的次數分配的統計檢定（未呈現於表），我們觀察到原漢之間、新來後到者之間以及閩客之間在幸福感的社會心理反應上有顯著差異。我們以年期趨勢和族群 / 省籍的互動項進行Multivariable fractional polynomial 模型估計，各組合之幸福感差異結果呈現於圖2之a、b、c和d。圖示中的實線為估計的差距，陰影呈現是估計值的信賴區間。實線座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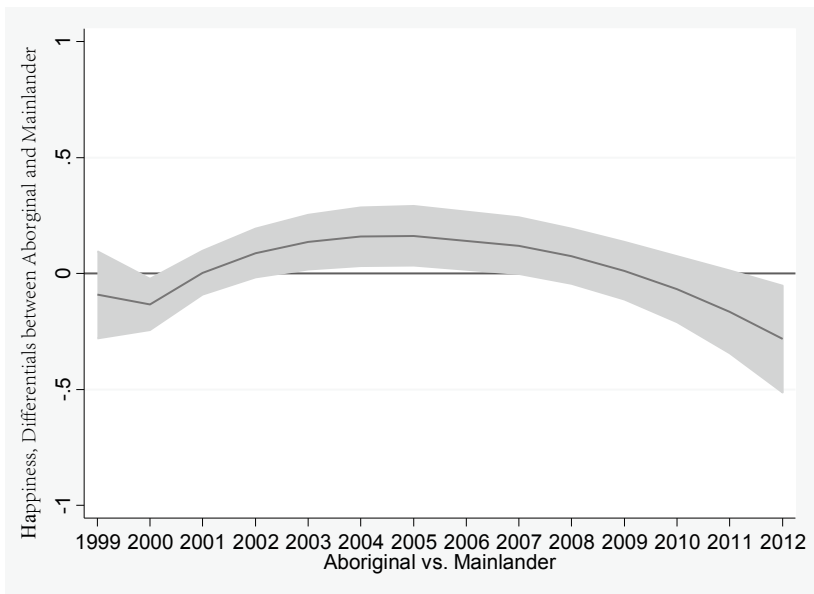
於「0」即表示參照組與比較之群體之間沒有差別，負值表示參照組之幸福感低於其比較群體，而正值則表示參照組的幸福感高於其比較群體。圖2a（參照組為漢人）顯示漢人和原住民在1999年時之幸福感，並沒有顯著差別，但之後，漢人的幸福感就一直高於原住民，到了2009年才再拉近，原漢之間再度呈現零距離。圖2b（參照組為閩客等較早之移民）呈現的是閩客與外省的比較。圖示閩客的幸福感受到2005年以前都高於後到的外省人，但之後二者開始拉近，而近似零距離。至於圖2c（參照組為外省人）原住民與後到的外省人相比則出現了兩個轉折，1999年到2000年時外省人的幸福感是高於原住民的。2002年至2007年間，外省人的幸福感持續落後，但差距拉近，而致2012年時觀察到外省人的幸福感再度高於原住民。可能因為樣本數的關係，許多年的差異都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最後，圖2d（參照組為閩南人）顯示，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幸福感受到1999年到2007年間，二者都沒有顯著差異。但閩南人的幸福感已逐漸高於客家人，二者之差呈線性上升，2008年以後即從負轉正，且逐年拉開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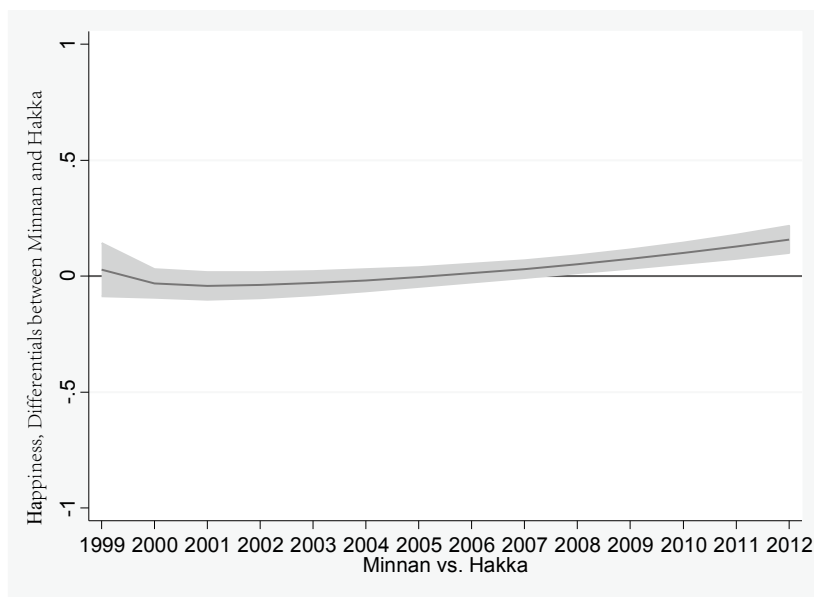
■圖2a 漢人與原住民之比較，N = 24,051



■圖2b 老移民（閩南 / 客家人）與新移民（外省人）之比較，N = 22,886



■圖2c 原住民與外省人之比較，N = 3,926



■圖2d 閩南人和客家人的比較，N = 19,889

綜合而言，1999年到2012年間台灣民衆幸福感的走勢是下滑的。這些年來不同族群 / 省籍歸者之間的差距已逐漸縮小，而且不論原漢、閩客和外省人間都觀察到差距縮小的現象。其中的例外在閩客之間，閩南人的幸福感，對比於客家人，優勢越來越大。

和圖2相互呼應的是表2迴歸分析的結果，族群 / 省籍群體之間的差異明顯可見，不僅它們在1999年的起點有明顯差距，其十四年的趨勢亦大不相同。具體來看，以人數最多的閩南人做為參考比較的群體，我們發現，就幸福感的起點水平來看，客家人稍低於閩南人，但不顯著。原住民和外省人均顯著地低於閩南人（分別為-0.043和-0.141）。三個群體於十四年間的幸福感趨勢，亦明顯與閩南人不同（表二之第二行）。

四個族群 / 省籍群體分開之模型估計，其結果呈現於表2的第三至六行。這四個模型估計的結果，清楚讓我們看到，對於這四個群體，男女差異和年齡效果是大不相同的。閩南人和原住民都未觀察到幸福感之年齡趨勢，而客家人和外省人一樣，年紀越大，幸福感越高。女性自認比較幸福，但原住民的女性

■表2 1999年至2012年幸福感之最小平方迴歸模型<sup>2</sup>估計結果。

	全樣本	全樣本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省人
年度趨勢	-0.022*** (0.006)	-0.026*** (0.006)	-0.015* (0.007)	-0.026 (0.018)	-0.143** (0.046)	-0.043* (0.017)
年度趨勢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2 (0.001)	0.011*** (0.003)	0.003** (0.001)
族群 / 省籍 (閩南人為參照組)						
客家人	0.045* (0.017)	-0.065 (0.036)				
原住民	-0.052* (0.026)	-0.143*** (0.038)				
外省人	-0.012 (0.017)	-0.141*** (0.035)				
客家人*趨勢		0.014*** (0.004)				
原住民*趨勢		0.023** (0.008)				
外省人*趨勢		0.017*** (0.004)				
年齡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0.002)	-0.005 (0.003)	0.003* (0.002)
女性	0.099*** (0.011)	0.098*** (0.011)	0.098*** (0.013)	0.092** (0.032)	0.057 (0.052)	0.111*** (0.032)
常數項	2.832*** (0.027)	2.862*** (0.028)	2.859*** (0.031)	2.702*** (0.084)	3.214*** (0.139)	2.705*** (0.086)
觀察值	24051	24051	17251	2638	1165	2761
R <sup>2</sup>	0.006	0.007	0.008	0.007	0.015	0.009

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sup>2</sup> 年度趨勢和族群 / 省籍歸屬為自變項，性別與年齡為控制變項。

卻不認為如此。原住民的低幸福感，普遍存於各年齡層，男性和女性都一樣。因年齡和性別效果之差異，趨勢的估計值也與圖2和表2之第二行之結果稍有不同，詮釋四個群體分開估計之結果，需要特別注意的。分開來看，這四個群體的幸福感到十四年間都呈下滑走勢，只是客家人的幸福感下滑走勢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閩南人幸福呈現直線下滑，原住民和外省人的幸福感雖逐年往下墜，但下墜的速度已減緩。就幅度而言，原住民下滑的幅度最大，其次為外省人和閩南人，最低是客家人。

## 伍、族群論述脈絡中的幸福感

根據幸福感的文獻以及台灣社會族群 / 省籍歸屬議題的論述脈絡，我們發展了三個主要研究假設，以理解民衆族群 / 省籍歸在幸福感上的差異，這三個假設分別與族群 / 省籍分層、我群意識與公平感受有關。為有效檢驗前述假設是否成立，模型比較的需要，我們只分析在教育程度、家戶所得、公平感受和我群意識等變項未有缺漏值的樣本。由於各年度資料含蓋不同的緣故，這部分分析的樣本數為跨越1999年到2009年的9,491筆，這是在閱讀本文發現應該注意之處。

在呈現主要研究發現之前，為了讓讀者對教育年數、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的趨勢和族群 / 省籍群體間的異同有所瞭解，在控制性別和年齡這兩個變項，其年度趨勢和族群 / 省籍異同之結果呈現於表3。未呈現於表3的是，單純估計其趨勢的結果。1999年到2012年間，台灣社會的教育年數持續增加，且增加的步伐已漸緩和。家戶所得亦然。我群意識在1999至2000年間由「有一半一半的人會幫助別人」向「一般人都只管自己的事」移動，之後，一直到2012年則逐漸回到「有一半一半的人會幫助別人」。公平感受則呈現相反下滑的趨勢，越來越多人在比較自己的生活水準和努力之後，從「還可以」向「不公平」滑動，而且加速滑移。從表3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同族群 / 省籍群體間的差異，不僅在起始點上有所差別，年度趨勢亦大不相同。以閩南人為參照群體，客家人只在教育程度上稍高，其餘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上，二者都是零距離，年度上的趨勢亦沒有差別。原住民在教育程度、家戶

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上均低於閩南人，但在趨勢上卻無異於閩南人。原住民在社經地位的劣勢以及負面的社會心理反應，與閩南人之間一直保持固定距離的落後。這個現象，需要我們深刻關切。最後，和閩南人相比，外省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具有優勢，但卻出現逐年下滑的趨勢，表示和閩南人距離逐年拉近。外省人的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等兩個社會心理反應要比閩南人來負面，但逐年往正面方向移動，雖然幅度不太，因而顯示與閩南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

■表3 1999年至2012年教育年數、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之最小平方迴歸模型<sup>3</sup>估計結果。

	教育年數	家戶所得	我群意識	公平感受
年度趨勢	0.250*** (0.021)	0.164*** (0.005)	-0.035*** (0.005)	-0.038*** (0.008)
年度趨勢平方	-0.003* (0.001)	-0.007*** (0.000)	0.003*** (0.000)	0.001 (0.001)
族群 / 省籍 (閩南人為參照組)				
客家人	0.542*** (0.134)	0.004 (0.029)	0.006 (0.029)	-0.030 (0.056)
原住民	-1.506*** (0.148)	-0.260*** (0.031)	-0.201*** (0.035)	-0.445*** (0.055)
外省人	2.097*** (0.124)	0.230*** (0.026)	-0.116*** (0.027)	-0.136** (0.050)
客家人*趨勢	-0.006 (0.015)	0.006 (0.003)	-0.002 (0.004)	0.007 (0.006)
原住民*趨勢	0.054 (0.029)	0.007 (0.006)	0.014 (0.010)	0.007 (0.012)

<sup>3</sup> 年度趨勢、族群/省籍歸屬、性別和年齡為自變項

	教育年數	家戶所得	我群意識	公平感受
外省人*趨勢	-0.041** (0.014)	-0.007* (0.003)	0.012** (0.004)	0.020*** (0.006)
年齡	-0.151*** (0.001)	-0.015***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女性	-0.596*** (0.038)	-0.097*** (0.008)	0.054*** (0.009)	-0.000 (0.016)
常數項	16.861*** (0.091)	1.736*** (0.020)	1.903*** (0.020)	3.197*** (0.036)
觀察值	32617	29328	21508	20272
$R^2$	0.301	0.168	0.011	0.010

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表3的結果在在顯示不同族群 / 省籍群體之間，在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心理反應上，都有明顯的落差。立基於前述的社會經濟條件及社會心理反應的群體落差，我們關切社經地位和社會心理反應上的落差，是否能解釋族群 / 省籍群體在幸福感上的差序。

### 一、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與社經地位效應

我們首先觀察到教育和家戶所得都是幸福的催化劑。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表4之模型一）。家戶所得亦然。家戶所得越高，幸福感越高（表4之模型二），而且，教育的幸福感效應，大部分是源自家戶所得（模型三）。教育和所得之納入考量，並沒有改變幸福感向下滑動的大局。重要的是，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仍明顯可見。一為原住民和外省人之幸福感顯著地低於閩南人，或是包括客家人在內的較早移民。其二，原住民的幸福感劣勢，部分源自於教育和所得的落後，但教育和家戶所得並無法解釋外省人幸福感劣勢。教育和家戶所得雖然顯著「預測」幸福感的高低，但如同文獻所發現，二者只能解釋幸福感變異量很小的一部分。如同研究假設一所推測，族群 / 省籍歸屬的

分層，在1999年至2012年的台灣，與教育和所得一樣，是個有意義的分層維度，但幸福感分層只在閩南人與外省人之間，以及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閩客之間並不明顯。

■表4 1999年至2009年幸福感之最小平方迴歸模型估計結果。<sup>4</sup>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年度趨勢	-0.040*** (0.010)	-0.043*** (0.010)	-0.061*** (0.010)	-0.061*** (0.010)	-0.051*** (0.010)	-0.033*** (0.009)	-0.029** (0.009)
年度趨勢平方	0.003** (0.001)	0.003**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族群 / 省籍 (閩南人爲參照組)							
客家人	-0.033 (0.028)	-0.036 (0.028)	-0.037 (0.028)	-0.037 (0.028)	-0.032 (0.028)	-0.022 (0.026)	-0.020 (0.026)
原住民	-0.112*** (0.031)	-0.097** (0.032)	-0.076* (0.032)	-0.076* (0.032)	-0.045 (0.032)	0.026 (0.030)	0.039 (0.030)
外省人	-0.111*** (0.026)	-0.123*** (0.026)	-0.130*** (0.026)	-0.129*** (0.026)	-0.124*** (0.026)	-0.098*** (0.024)	-0.096*** (0.024)
教育年數		0.007** (0.003)		-0.000 (0.003)	0.000 (0.003)	-0.005* (0.002)	-0.005 (0.002)
家戶所得			0.101*** (0.012)	0.102*** (0.013)	0.104*** (0.013)	0.043*** (0.012)	0.045*** (0.012)
我群意識					0.138*** (0.012)		0.065*** (0.012)
公平感受						0.299*** (0.007)	0.293*** (0.007)
年齡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sup>4</sup> 年度趨勢、族群 / 省籍歸屬、教育、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爲自變項，性別和年齡爲控制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女性	0.057*** (0.017)	0.060*** (0.017)	0.076*** (0.017)	0.076*** (0.017)	0.070*** (0.017)	0.076*** (0.015)	0.073*** (0.015)
常數項	2.966*** (0.040)	2.853*** (0.057)	2.810*** (0.044)	2.814*** (0.057)	2.533*** (0.063)	2.000*** (0.057)	1.885*** (0.060)
	0.007	0.008	0.014	0.014	0.026	0.163	0.165

觀察值 = 9,491。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二、我群意識的幸福感效應

我群意識提高幸福感（模型五），且部分解釋了各群體幸福感下墜的走勢，幸福感下墜的幅度和速度部分和民衆的我群意識有關。除此之外，我群意識的納入使得原住民的幸福感劣勢減半，且在統計上不顯著，但卻無助於理解外省人幸福感劣勢。

## 三、公平感受的幸福感效應

公平感有力地預測幸福感的高低（模型六）。部分解釋了各群體幸福感下墜的走勢，幸福感下墜的幅度和速度部分和民衆覺得自己努力和回報「不公平」有關。同時，原住民之所以幸福感落後於閩南人，可以說是全來自於公平感受。外省人幸福感落後，部分因為公平感受。

將模型七與前述之模型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與社經差異似乎沒有太多重疊。重疊之處在原住民的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部分解釋了原住民幸福感的落後。族群 / 省籍，一如社經地位以及性別和年齡，可以有效將幸福感分層，雖然這些分層指標總體的解釋量不高。考慮趨勢、年齡、和性別後，大體上，閩南人和客家人之間的界線比較模糊，閩南人和原住民及外省人間較為明顯。其次，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等社會心理反應，有助於理解幸福感在族群 / 省籍歸屬上的差異。而公平感受的影響遠比比我群意識來得大，而且部分我群意識的效果是透過公平感而影響幸福感。本節的研究發現似乎告訴我們，1980年以後的族群論述，如果對民衆之幸福感受有所影響，

有可能是因爲牽動了民衆的社會心理反應，就本研究而言，主要牽動了民衆的公平感受，而影響幸福感的評估。對原住民而言，社經條件和社會心理反應，都可以解釋其何以向“不幸福”的方向偏移，而外省人則主要是因爲社會心理反應。

## 陸、族群 / 省籍差異的確認

社會意向調查各次電訪之內容不盡相同，本研究所關心的題目，不一定出現在同一次調查，加以中間偶有缺漏值，檢驗幸福感之相關假設，樣本數由24,051掉到9,491，而且跨越1999年到2009年間。它所呈現的基本圖像（即只控制年度趨勢、性別和年齡）與以1999至2012年資料的分析略有不同。二套資料的結果差別在於2008之後是否微幅上揚以及族群 / 省籍幸福感差異值之大小。因而我們決定採取充分運用資料的策略，以確認前節的研究發現。我們仍然運用1941年和1980年間出生的所有可能樣本數，除了教育和家戶所得外，樣本一爲只納入我群意識，樣本數爲13,897，年度是1999年和2012年間，其中缺2008、2010和2011三年；至於樣本二則只納入公平感受，樣本數爲13,770，年度介於1999和2011年間，缺2012年之資料。我們各分析了三個模型，樣本一之模型一和模型二比較，可以做爲評估教育和家戶所得之作用之參考；模型一和模型三的比較，則可做爲評估我群意識的作用。同理，樣本二之模型一與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比較，可以評估教育和家戶所得以及公平感受的作用。

簡言之，不同樣本得到的結果，雖不完全相同，但大體上可以確認前節的研究發現。具體而言，一如表4之發現，表5以樣本一與樣本二所估計的模型二同樣都觀察到教育和所得對幸福感的作用。與前節不同之處在於樣本一的模型分析結果，仍然有顯著的教育作用。在同時考慮而運用較大樣本的資料顯示，觀察幸福感的族群 / 省籍差異，必須考慮教育和家戶所得的因素。原住民和外省人，不僅幸福感水準低，而且趨勢亦顯著不同。總而言之，我們有信心指出，在台灣，族群 / 省籍是幸福感分層的重要維度。

■表5 不同篩選樣本下，1999年至2012年間幸福感之最小平方迴歸模型估計結果。<sup>5</sup>

	樣本一(N=13892)			樣本二(N=13769)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年度趨勢	-0.030*** (0.007)	-0.041*** (0.007)	-0.035*** (0.007)	-0.042*** (0.008)	-0.061*** (0.008)	-0.039*** (0.007)
年度趨勢平方	0.001** (0.000)	0.002***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4*** (0.001)	0.003*** (0.000)
族群 / 省籍 (閩南人爲參照組)						
客家人	-0.028 (0.024)	-0.032 (0.024)	-0.031 (0.023)	0.018 (0.023)	0.011 (0.023)	0.016 (0.021)
原住民	-0.099*** (0.029)	-0.074* (0.029)	-0.049 (0.029)	-0.088** (0.030)	-0.041 (0.030)	0.044 (0.028)
外省人	-0.068** (0.023)	-0.087*** (0.023)	-0.082*** (0.023)	-0.058** (0.021)	-0.079*** (0.021)	-0.062** (0.020)
教育年數		0.004 (0.002)	0.005* (0.002)		0.000 (0.002)	-0.005* (0.002)
家戶所得		0.070*** (0.011)	0.073*** (0.011)		0.130*** (0.011)	0.060*** (0.010)
我群意識			0.136*** (0.011)			
公平感受						0.285*** (0.006)
年齡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sup>5</sup> 年度趨勢、族群 / 省籍歸屬、教育、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爲自變項，性別和年齡爲控制變項。

	樣本一(N=13892)			樣本二(N=13769)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女性	0.042** (0.014)	0.053*** (0.014)	0.047*** (0.014)	0.098*** (0.014)	0.118*** (0.014)	0.107*** (0.013)
常數項	2.954*** (0.034)	2.778*** (0.049)	2.509*** (0.053)	2.887*** (0.034)	2.663*** (0.049)	1.971*** (0.047)
R <sup>2</sup>	0.004	0.009	0.020	0.007	0.019	0.166

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樣本一之模型三為的是確認我群意識的作用。與表4結果一致的是，我群意識提昇個人幸福感。同樣的，我群意識可以解釋何以原住民幸福感較低，但卻無助於理解何以外省人於幸福感的低落。同樣的邏輯，樣本二之模型三結果顯示，公平感受有助於幸福感的提昇。公平感受不僅有助於理解何以原住民幸福感之落後，也有助理解外省人幸福感的落後。考量教育、家戶所得和我群意識（樣本一之模型三），或是考量教育、家戶所得和公平感受（樣本二之模型三），外省人的幸福感劣勢，仍明顯可見。也就是說，教育程度、家戶所得以及同樣程度的社會心理反應（二者同時考量，或擇一考量），是原住民幸福感落後的主要機制，但這些社經條件和社會心理反應並無法全然解釋外省人幸福感何以低於閩南人。同時，公平感受這類社會心理反應單獨至少可以解釋14%以上的幸福感變異量，顯示出公平感受之於幸福感的重要性，是重要的中介機轉。

## 柒、世代之間的比較

最後，前述使用的是戰爭前後出生在台灣得受完整教育，且成長於黨國威權體制的一群人（此後稱為中年世代），經過民主化歷程，於1999年到2012年間，幸福感受的起伏以及相關原因的探討。我們要問到，這群人的經驗以及族群／省籍間差異，是否有別於早在1941年以前出生，在大陸成長的外省人或是生活在日本人殖民統治之下的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此稱為老年世

代)？是否又有別於1980以後出生在台灣，無論父母親的籍貫，他們的父母親都是生活於台灣的一群人(青年世代)？同樣考慮結果的可否比較，我們使用未有缺漏值的樣本，老、中、青三個世代的樣本數分為857人(1941年前出生者，資料含括1999-2009)、9,567(1941年至1980年間出生者，資料含括1999-2009)和467(1980年後出生者，資料含括2002-2009)。我們使用這三組資料，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於表6。表6前三行是包含時序和族群 / 省籍歸屬之結果，後三行則是納入教育年數、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的分析結果。

■表6 以世代分，1999年至2012年間幸福感之最小平方迴歸模型估計結果。<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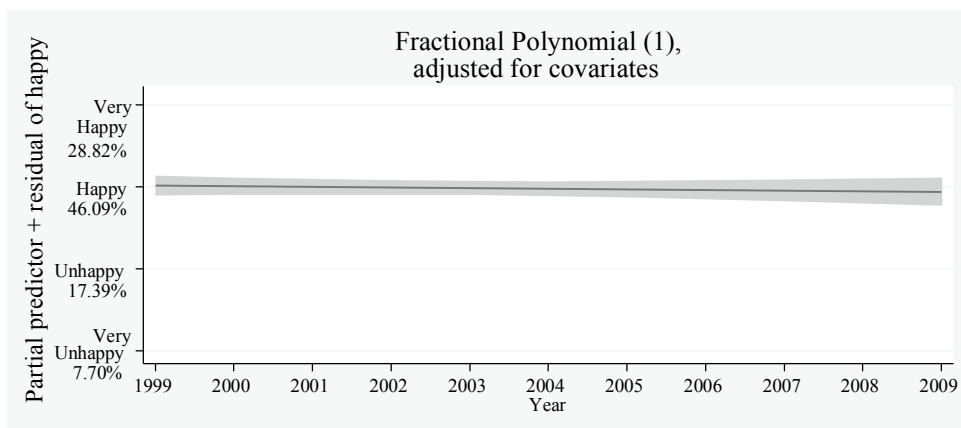
	青年 世代	中年 世代	老年 世代	青年 世代	中年 世代	老年 世代
年度趨勢	-0.011 (0.013)	-0.039*** (0.010)	-0.260* (0.101)	0.001 (0.011)	-0.029** (0.009)	-0.249* (0.097)
年度趨勢平方		0.003** (0.001)	0.018** (0.006)		0.002** (0.001)	0.017** (0.006)
族群 / 省籍 (閩南人為參照組)						
客家人	0.220 (0.216)	0.004 (0.055)	0.200 (0.332)	0.152 (0.091)	-0.020 (0.026)	0.036 (0.100)
原住民	-0.395 (0.493)	-0.005 (0.058)	0.871 (0.899)	-0.130 (0.277)	0.039 (0.030)	0.407 (0.233)
外省人	-0.036 (0.144)	-0.097* (0.047)	0.134 (0.339)	-0.038 (0.074)	-0.096*** (0.024)	0.037 (0.106)
客家人*趨勢	-0.000 (0.036)	-0.007 (0.009)	-0.020 (0.041)			

<sup>6</sup> 年度趨勢、族群 / 省籍歸屬、教育、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為自變項，性別和年齡為控制變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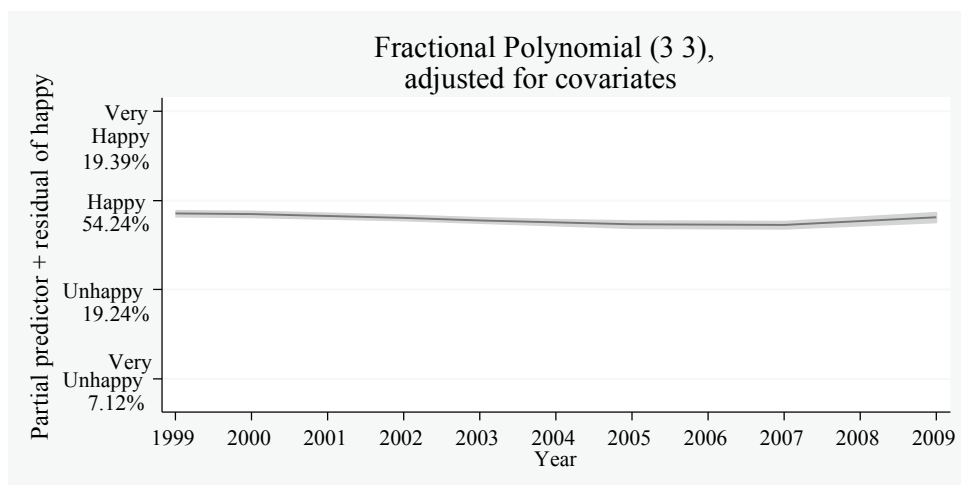
	青年 世代	中年 世代	老年 世代	青年 世代	中年 世代	老年 世代
原住民*趨勢	0.019 (0.082)	-0.044* (0.020)	-0.088 (0.110)			
外省人*趨勢	0.005 (0.025)	-0.003 (0.008)	-0.005 (0.044)			
教育年數				0.002 (0.006)	-0.005 (0.002)	0.017 (0.009)
家戶所得				0.084* (0.038)	0.045*** (0.012)	0.073 (0.044)
我群意識				0.142*** (0.036)	0.065*** (0.012)	0.197*** (0.056)
公平感受				0.315*** (0.024)	0.293*** (0.007)	0.199*** (0.029)
年齡	0.000 (0.006)	-0.000 (0.001)	-0.035* (0.017)	-0.000 (0.006)	0.000 (0.001)	-0.031* (0.015)
女性	-0.077 (0.064)	0.057*** (0.017)	0.137* (0.066)	-0.064 (0.059)	0.073*** (0.015)	0.154* (0.061)
常數項	2.996*** (0.402)	2.956*** (0.041)	4.481*** (0.439)	1.727*** (0.375)	1.885*** (0.060)	3.000*** (0.458)
觀察值	857	9490	461	857	9490	461
R2	0.010	0.007	0.042	0.225	0.165	0.183

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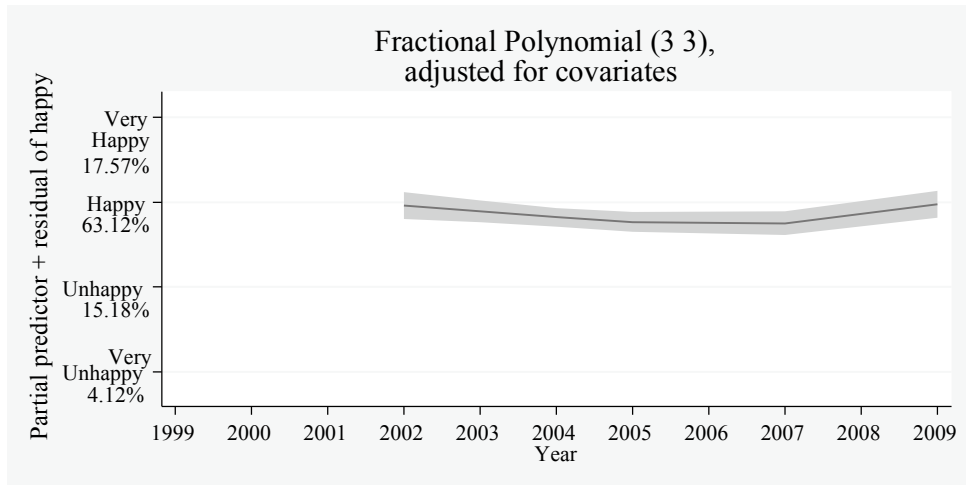
爲了讓讀者對老、中、青三個世代的受訪者幸福感的趨勢有些掌握，圖3分別呈現了幸福感的趨勢。所有的分析都控制性別和年齡。從圖3的三個圖來看，世代之間幸福走勢差別明顯。老年世代大約在「3」上下，也就是自覺快樂，而且1999年到2009年間，沒有明顯起伏。中年世代和青年世代的幸福水



■ 圖3a 1999年至2009年老年世代之幸福感趨勢



■ 圖3b 1999年至2009年中年世代之幸福感趨勢



■圖3c 2002年至2009年年輕世代之幸福感趨勢

準介於快樂和不快樂之間，但較靠近快樂。這兩個世代在2007之後都有一個明顯的上揚，而青年世代的幅度稍微大些。至於族群／省籍差異，唯老年閩南人的幸福感顯著地高於客家人和外省，其他並沒有觀察到群體間有明顯差異。有了這個基線，我們在表6的後三行，可以看到三個世代，有關教育、家戶所得、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對於幸福感的作用不盡相同，對於幸福感的族群／省籍落差之影響亦不盡相同。首先，教育在考慮了家戶所得後，對三個世代的幸福感都沒有顯著預測力。家戶所得則不然，只有對青年世代的幸福沒有顯著幫助。我群意識和公平感受都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預測因子。我群意識越強，公平感受愈高，幸福感愈高。由於青年世代的幸福感各群體間並沒有呈現什麼差異，因而也無以指稱族群論述對青年世代的幸福感評估有什麼影響。

## 捌、結論

1999年到2012年間，跨越兩個台灣重大的政治發展。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和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似乎都沒有改變民衆對個人幸福感下滑的走勢。1980中期之後台灣社會經歷的以政治民主訴求而操作的族群論述，進入二十一世紀，仍然可以觀察到其對民衆社會心理的效應。族群／省籍群體仍然

是獨立於教育和家戶所得的另一重要的社會分層維度。如果說這是族群論述的影響，這個影響顯然對青年世代沒什麼作用，對年老的閩南人，則自覺較為不幸福。族群論述似乎並沒有因為牽動年輕民衆的我群意識而影響個人幸福感的評估。但是，族群論述的確牽動了民衆的公平感受，而得以理解各群體間幸福感的差異。公平感受是個重要的中介機制。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原住民在1980年代之後一連串的族群運動，主張原住民的社群權利，包括「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原住民的權益維護到了1990年代雖有大幅進展，台灣正式進入多元文化的社會（張茂桂，1999；紀駿傑，2005）。然而，本研究資料分析顯示，原住民在教育和經濟上的弱勢，仍然顯而易見。不僅如此，原住民之所以幸福感低，是因為感受不到這個社會「像一家人那樣願意互相幫助」且感受不到公平對待。就多元文化的台灣社會，原住民在各方面的落後，恐怕需要強而夠力的政策工具，始得以有效拉近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距離。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本質上是移民社會。除了原住民外，本地的居民只有先來後到之別，都屬漢人。然而，1990年後，新一批的移民，來自不同國家、是屬不同種族，使用不同語言，以不同的身分，定居於台灣。台灣是否能接納這新一波的移民，平等對待之，具高度挑戰，值得密切觀察。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王甫昌，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第4期，12月：頁11-74。
- 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第1期，12月：頁137-167。
- 林忠正、林鶴玲，1993，「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101-155。
- 林鶴玲、李香潔，1999，「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2期，12月：頁475-528。
- 紀駿傑，2005，「原住民研究與原漢關係——後殖民觀點之回顧」，**國家政策季刊**，第4卷第3期，9月：頁5-28。
- 張芷雲，2011，「他們幸福嗎？為什麼？台灣與香港民眾的比較，2000～2005」，蕭新煌、尹寶珊、王家英編，**解讀港臺社會意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頁33-55。
- 張茂桂，1999，「「新台灣人」之非論」，**當代**，第137期，1月：頁66-77。
- 張嘉尹，2008，「多元族群、國家認同與台灣的憲政改革」，**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期，3月：頁109-166。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第10期，12月：頁1-40。
-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第1期，6月：頁1-44。
- 蔡淑鈴，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研究**，第7期，6月：頁47-88。
-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第29期，6月：頁117-152。
- 蘇國賢、喻維欣，2007，「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

異的縮減」，*台灣社會學刊*，第39期，12月：頁1-63。  
顧忠華，2004，「總統大選結果的社會意義」，*當代*，第201期，5月：頁44-53。

## 英文書目

- Alesina, A., R. Di Tella, and R.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8, pp. 2009~2042.
- Alwin, Duane F. 1987.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Material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1 (February), pp. 83~95.
- Camoroff, John L., and Jean Camoroff. 2009. *Ethnicity* (Chicago: Chicago Press).
- Caporale, G. M., Y. Georgellis, N. Tsitsianis, and Y. P. Yin. 2009. "Income and Happiness Across Europe: Do Reference Values Matte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30, no. 1 (February), pp. 42~51.
- Clark, A.E., and A.J. Oswald.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61, no. 3 (September), pp. 359~381.
- Di Tella, R., R. J. MacCulloch, and A. J. Oswald. 1997.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CEP working paper*, no. 19.
- Di Tella, R., R. J. MacCulloch, and A. J. Oswald.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1 (March), pp. 335~341.
- Di Tella, R., and R. MacCulloch. 2008.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 An Answer to the Easterlin Paradox?,"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6, no. 1 (April), pp. 22~42.
- Dorn, D., J. A. V. Fischer, G. Kirchgässner, and A. Sousa-Poza. 2006. "Is It Culture or Democracy? The Impact of Democracy and Culture on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82, no. 3 (August), pp. 505~526.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89~125.
- Easterlin, R.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7, pp. 35~47.
- Ferrer-i-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5 (June), pp. 997~1019.
- Firebaugh, G., and M. B.Schroeder, 2009. “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 *AJS*, vol. 115, no. 3 (November), pp. 805~831.
- Frijters, P., J. P. Haisken-DeNew, and M. A. Shields. 2004. “Money Does Matter! 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3 (June), pp. 730~740.
- Graham, C, and S. Pettinato. 2000.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2, pp. 237~268.
- Hagerty, M. R., and R. Veenhoven. 2003. “Wealth and Happiness Revisited—growing National Income Does Go With Greater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64, no. 1 (January), pp. 1~27.
- Inglehart, R., and H. D. Klingemann. 2000. “Genes, Culture, Democracy, and Happiness,” in Edward Diener and Eunkook M. Suh ed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A, Cambridge: A Bradford Book), pp. 165~183.
- Inglehart, R., R. Foa, C. Peterson, and C. Welzel. 2008.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3, no. 4 (July), pp. 264~285.
- Jao, JC., and M. McKeever. 2006.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9, no. 2 (April), pp. 131~152.
- Lin, HL. 1998. “Gender Culture as Economic Determinant: Household Resource

- Allocation Strategies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vol. 10, pp. 611~659.
- Liao, PS, YC. Fu, and CC. Yi. 2005.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 Intra-culture Comparis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6, no. 1 (February), pp. 43~67.
- Rojas, M. 2005. “A Conceptual-referent Theory of Happiness: Heterogene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74, no. 2 (January), pp. 261~294.
- Sauerbrei W, Royston P. 1999. 2002. “Building Multivariable Prognostic and Diagnostic Model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edictors by Using Fractional Polynomi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62:71-94. *Corrigendum: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65:399-400.
- Scheinfeld, E., and Stjepan G. Meštrović. 1989. “Durkheim’s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al Solidarity,” *Sociological Analysis*, vol. 50, no. 2 (Summer), pp. 111~127.
- Schnittker, J. 2008. “Happiness and Success: Genes, Famili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4 Suppl, pp. S233~S259.
- Stiglitz, J. Sen, A. and J. Fitoussi.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Retrieved: May 31, 2014).
- Tam, T. 2007. “The Institutional Making of Ethnic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with Adjustments fo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Tsai, SL., and HY. Chiu. 199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vol. 3, pp. 188~202.
- Yang, Y. 200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3, no. 2 (April), pp. 204~226.

# Happiness and Ethnicity in Taiwan, 1999-2012: Social Stratification, Sense of We-group, and Social Justice

Ly-Yun Chang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ony T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Abstract

Ethnicity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sociopolitical issues in Taiwan. This study examines ethnic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as a psycho-social outcome of the intensely ethnic discourse in Taiwanese politics since the 1980s. It also tests the hypotheses of class stratification, group solidar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by pooling the 1999-2012 Social Image Surveys. There are three major finding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happiness has declined, moving from being happy to being unhappy.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between Minnan and Aborigine and between Minnan and Mainlander, but not between Minnan and Hakka. Ethnicity differences have narrowed since 2006 and persistent after the second change in the ruling party. (3) Education, family income, sense of we-group, and sense of fairness accounted for the differentials between Minnan and aboriginals in happiness. In contrast, such factors did not account for the gap between Minnan and Mainlanders.

**Keywords:** Happiness, Ethnic Differential, Solidarity, Social Justice, Taiwan Social Image Survey